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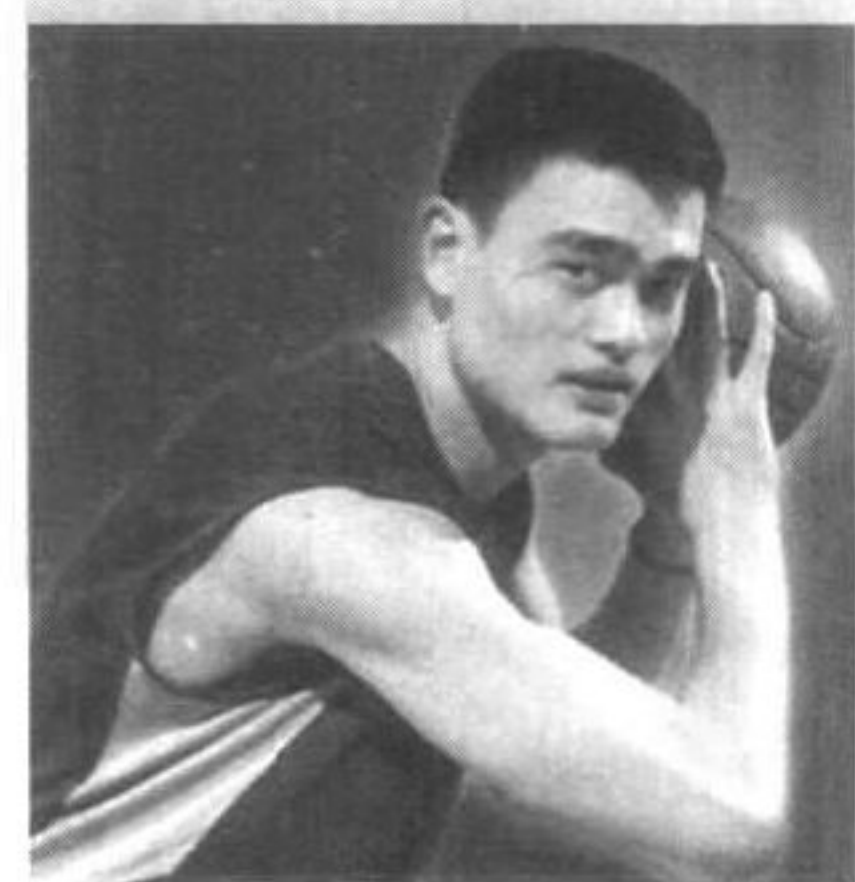
方宏进 劳春燕 为您打开

—— 激扬历史的人物



江 潜 主编

复旦大学 出版社



序

黎瑞刚

时针指向了深夜12点，我结束了今晚的第3场会议，回到办公室，终于有了些许时间为东方卫视开播后孕育出的第一本书写上几句感慨、祝福和感谢。

东方卫视是一个梦想，一个并不轻松的梦想。对所有投身其间并付诸情感的人来说，这将是一次看不见终点的赛跑，一场用心力体验周遭、用坚韧直面未来的漫长磨砺。选择东方卫视，我们也就选择了自己的职业信仰，选择了历史托付的责任，选择了为我们民族打造属于自己的传媒品牌的荣光与梦想。从第一财经到东方卫视，再到2004年我们内心涌动的创意和激情，我们的传媒集团始终坚定不移，我们可以说和这些激荡2003年的人们精神相通。喜与苦，成功与坎坷，无论前程怎样，我们信守“坚持就是胜利”。也许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只是社会嬗变的几朵浪花，但它们凝聚着我们这一代中国传媒人的爱与理想。

感谢方宏进、劳春燕、江潜等主创人员执著的投入，感谢陈梁、徐威等所有卫视参与者艰苦的付出，也感谢所有伴随着我们成长，为我们的梦想而激动的人们！我们将脚踏实地地不懈努力！

（作者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

2004年1月15日

序.....	黎瑞刚
钟南山：总有目标在前方.....	(1)
杨利伟：时刻准备着.....	(39)
陈忠和：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63)
郭光允：逼出来的反腐英雄.....	(93)
龙永图：总有一种信念.....	(117)
姚明：适者生存.....	(143)
王石：健康人生.....	(169)
苏向祥：生命不息诉讼不止.....	(197)
贾迈勒：像军人一样坚守岗位.....	(229)
梅艳芳：芳华绝代灿烂静美.....	(261)
后记.....	江潜 (285)

他不惟上，只惟实。

他不惧权威，坚持实事求是。

在抗击SARS的战斗中，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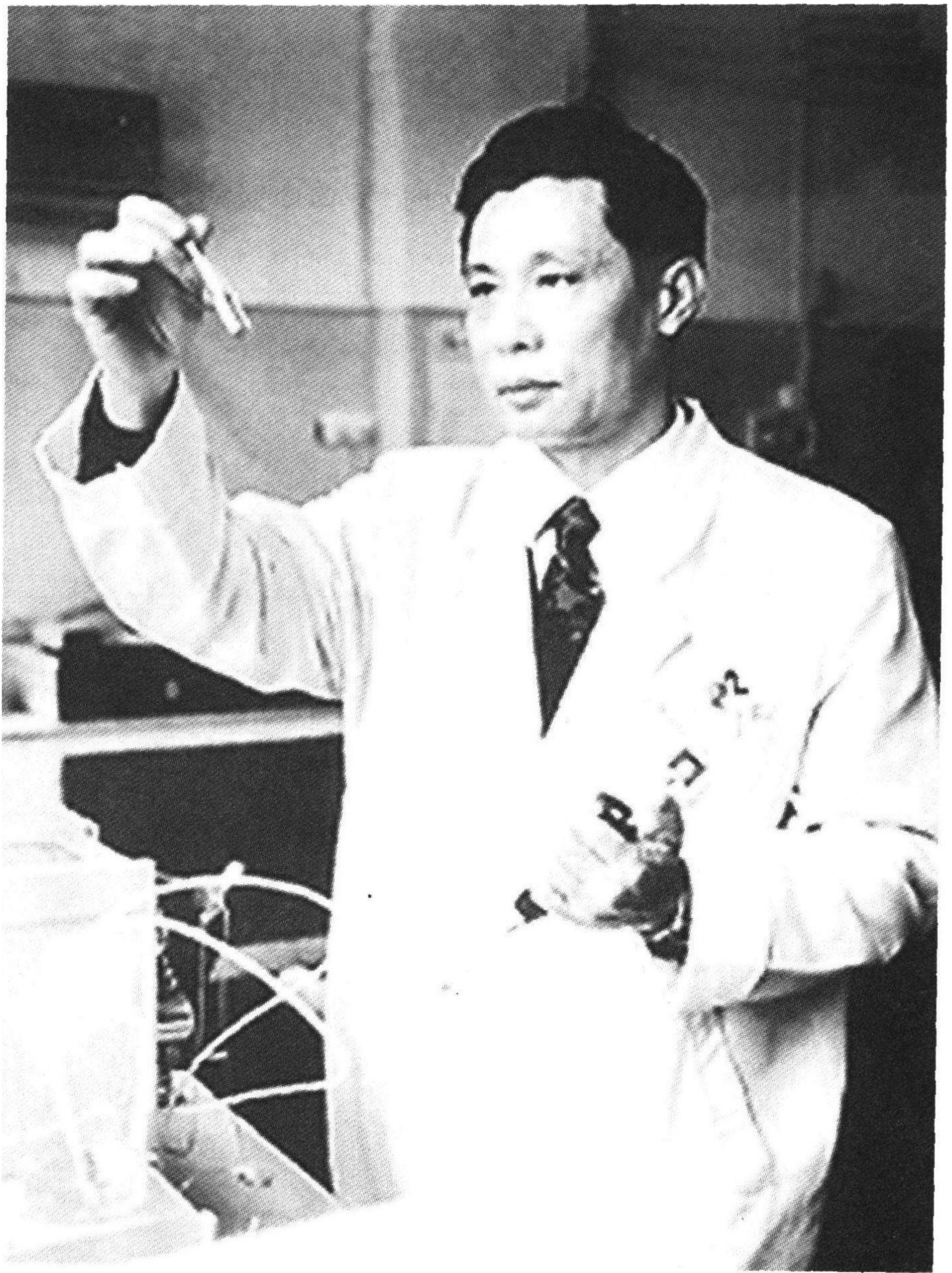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他发出了2003年最震撼的声音。

他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道德的品格。

——题记

钟南山：

总有目标在前方





忙碌的院士

一个人的勇气与才智如何在危难之际，感动一个国家，成为社会中一股清洁的力量，成为所有人的信赖。

——《钟南山传奇》作者 魏东海

这就是钟南山，这样的学者，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悲悯，这样的平常心。微斯人，吾谁与归？！

——《南风窗》总编辑 秦朔

人物沧桑

钟南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祖籍福建福州，名医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出生于“石头城”南京，在南京沦陷前，随父母迁徙到贵阳，11岁举家迁居广州。

2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此后却因其体育特长而出人头地。烧过锅炉，做过农民，干过宣传队，36岁那年才当上医生，不惑之年后，考上“文革”后第一次公费出国留学。后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10年。

主持人感言

钟南山难得的笑容

劳春燕

钟南山不苟言笑，所有的编导都觉得他够“酷”。要采访到他，难；要采访好他，更难；而要让他采访中笑，我几乎以为是不可能的了。直到他真的露出了笑容——他说到了他最快乐的时刻，就是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

来的那一刻。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容。

2003年12月19日下午4点，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海印分院的会议室，钟南山带着一贯冷峻的神情坐在我面前。他穿着黑色条纹西装，白衬衫，打着一条深蓝色领带，显得很精神。几分钟之前，我们在16楼碰面，工作人员告诉他采访场地布置在13楼，钟南山想也没想，很干脆地说：“别等电梯了，走楼梯吧。”边说边走过去推开消防通道的门，一行人都跟着走了下去。我得承认，钟南山下楼梯的速度比大多数人都要快，看得出他很在意时间，也很能控制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很喜欢采访科学家，虽然他们在镜头前可能会显得过于严肃，但通常他们会以职业性的严谨和诚实来回答问题，并且，假使正好问对了问题，他们也会展露幽默的一面。比如说，当了10年广州医学院院长的钟南山，我问他当官有什么好处，他略一迟疑，这样回答我：“当官能坐车子，吃饭也挺多。”周围的人全乐了，只有钟南山没有笑，他接着说：“但是当官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讲，当官是在作奉献，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你并不感兴趣的问题。”

而更多的时候，诚实本身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外界都知道钟南山在抗非最关键的时候曾经病倒在岗位上，但他自己却从不曾仔细谈及那次生病的经历。这次采访中我问他，回家歇着的那两天，有没有为自己的健康担心。他的回答这样开始：“不是2天，是5天。”他本可以含糊其辞的，虽然2天和5天并不代表什么，但显然他并不准备去做一个被美化的英雄，哪怕这种美化并非缘

于刻意。

把防非典进行到底

劳春燕：对您来说2003年是不是特别繁忙的一年？也是压力特别大的一年？

钟南山：是的，应该说既繁忙也压力大。

劳春燕：对您来说，在这场非典战役当中您在什么时候真正感到松了一口气？



钟南山在广州接受主持人劳春燕的访谈

钟南山：到现在还没松口气，因为没办法松口气，最近整个世界整个国家都在非常警惕非典卷土重来，而且现在在台湾地区出现一例很肯定的非典诊断病人。所以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松口气的时候。

劳春燕：那么非典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呢？

钟南山：这要看对卷土重来的理解是什么，假如说是一个大的疫情的话，我认为不会。但是出现个别病例，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一个传染病不可能一下子就销声匿迹，如果出现少数病人，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劳春燕：您第一次被公众所认识是在2003年的2月11日，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大家说非典是可控、可防、可治的，不知道您当时说这个话时有多少信心？

钟南山：我讲这个话我还是根据我们临床的实践，因为我们接触的是最重的病人，通过对这些最重病人的治疗，我们体会到主要是近距离飞沫感染，另外，病人经过一个发病期后自己会恢复。因此，假如说能够有效地注意传染途径，进行预防，另外，假如说有积极的疗法，避免病人死亡，仅仅从这两条来看，非典是可防、可治的。

劳春燕：非典的疫苗要两三年才能研制出来，假使现在非典又复发的话，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治愈它？

钟南山：现在看起来，没有一种特效药能够治愈SARS。目前在香港正在试验一些类似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发现对治疗非典有一些疗效，不过还需要试验来证实。如果采用中西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法，治愈率可以达到90%，有可能使非典病死率降到最低，类似于一般流感。

主动请缨战非典

劳春燕：您是呼吸病研究所三位创始人之一，我想问一下，当时您要把那些病人接到您的医院里来，您意识到您要承担的这些风险和责任吗？

钟南山：意识到。因为对病人来说，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假如说经过我们的治疗，这些病人的死亡率小一些的话，那为什么不接过来呢？

劳春燕：您周围的护士和医生，他们是怎么想的？

钟南山：我想他们也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正好也是专门研究这一行的，你搞呼吸的碰上呼吸疾病的重

症，有什么道理不把他们接过来？

劳春燕：有人有顾虑吗？假使他们没有顾虑，他们也有朋友有家人。

钟南山：有顾虑，有顾虑。我想每个人都有顾虑，所以每个人都比较紧张，但都没出声，更加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特别注意穿好防护服、洗手呀，避免跟家人太多的接触。另外，我们从前期的规律发现，最重要的是室内通风，如果室内通风好，我想绝大多数交叉感染是能够预防的。我们出现的感染全部是在零距离接触下感染的，比如说做气管插管时，病人有咳嗽，医护人员就感染上了。



身处抗非第一线

劳春燕：您在你们医院里第一次宣布要把这些病人都接过来的时候，您跟大家都讲了什么？

钟南山：医院领导和我们都曾有过一些顾虑：都转过来的话，一是我们的感染机会将明显增加；二是，如果老百姓知道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都是收SARS病人的，那么其他方面的病人就都不敢来了。

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附属医院的领导经过认真讨论，不过讨论并不是太长，大家觉得还是有一个责任。假如说社会上这些病人死的很多，这些病人到处放，被感染的人就会更多，这样的话，社会混乱会更加严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像平时那样，把大家都召集起来举行一个所谓的誓师会，而是很自然地跟大家讲，转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要对这些病人进行抢救，我们要想办法降低病死率，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

呼吸所医护人员零死亡率

劳春燕：那后来这个病的传染率，包括对于医生和护士的感染率是不是也超出了您预先的估计呢？

钟南山：是的，特别是后来很重的病人转过来后。这些重

症病人一到我们这儿就要上管子，进行气管切割，而这时候我们还没有一套比较有效的防护措施，但是这些医生都非常积极地去进行这样的操作。我们有一个医生，还有一位护士，给一个病人做插管，他戴了四层口罩，也戴了眼镜，但是3天以后，他们还是照样病了。

那时大家的防护知识不够，但是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能够看着病人快要死亡了而不管他们。

劳春燕：当时差不多是每做一个插管就要倒下两三个医生或者护士，在那样的情况下，您怎样保证大家的士气？

钟南山：到3月份和4月份时，确实是这样的。我想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也保证不了。但是后来我们调整了一下，同时上级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部门也给了我们比较好的防护措施，特别是面罩，全身的防护，这大大地保证了不会进一步出现感染。

劳春燕：在这一过程当中，您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鼓励他们，鼓励您的这些下属？

钟南山：我想最重要的是责任。因为我们是干这一行的，那么就必须担负起这一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

的同事，这些医生和护士不用我讲太多，因为他们平时也都是这么做的，凡是这些重症病人，就是应该由我们医治。

就像搞心脏抢救的医生，如果出现心脏急性危重病人的话，那应该是心脏科医生的事，他们应该义不容辞的。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做更多的思想工作，每个人自然而然地都有这个责任感。

劳春燕：那您在看到您的部下倒下的时候，心里是怎样想的？

钟南山：我是非常难受的。他们为了抢救别的病人而倒下，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办法为他们作出防护，这是非常难受的。

劳春燕：我听说您非常关心这些生病的部下，即使是出差也会经常打电话来问他们的情况？

钟南山：不关心不行呀。他们都在第一线，他们每天都在直接接触病人，他们病了以后，要是其中有一个出现严重情况，甚至死亡的话，这对整个研究所的士气以及我们抗非典的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影响。

所以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都要注意他们病情的发展，好在我们14个病倒的医护人员，由于及

时进行随访，并且密切观察，最后没有一个需要插管，更没有一个死亡。

劳春燕：这14位倒下的医务人员，他们的治疗方案都是您亲自做的吗？

钟南山：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误解，好像这些方案是由我一个人来制定，其实很多方案是集体共同来讨论的。我作为研究所的负责人，负责协调、统一，很多方案的提出，实际上是下面实践得出的结果。

所以不能说每一个方案都是由我来制定，我们有一个原则：经过十几位、二十位专家共同讨论，讨论很多次，才定出治疗方案，然后大家就按这个方案做。

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的病人，在我查房时来对治疗方案进行适当调整，这种情况是有的。

怕失败就不用做

劳春燕：钟院士，您在SARS治疗过程中，本身也是在一边试，一边治，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害怕过失误？

钟南山：对一个未知的事物，不知道应该怎么诊断，怎么